



史記注譯

(一)

王利器 主編

三秦出版社



史記注譯

(二)

王利器 主編

三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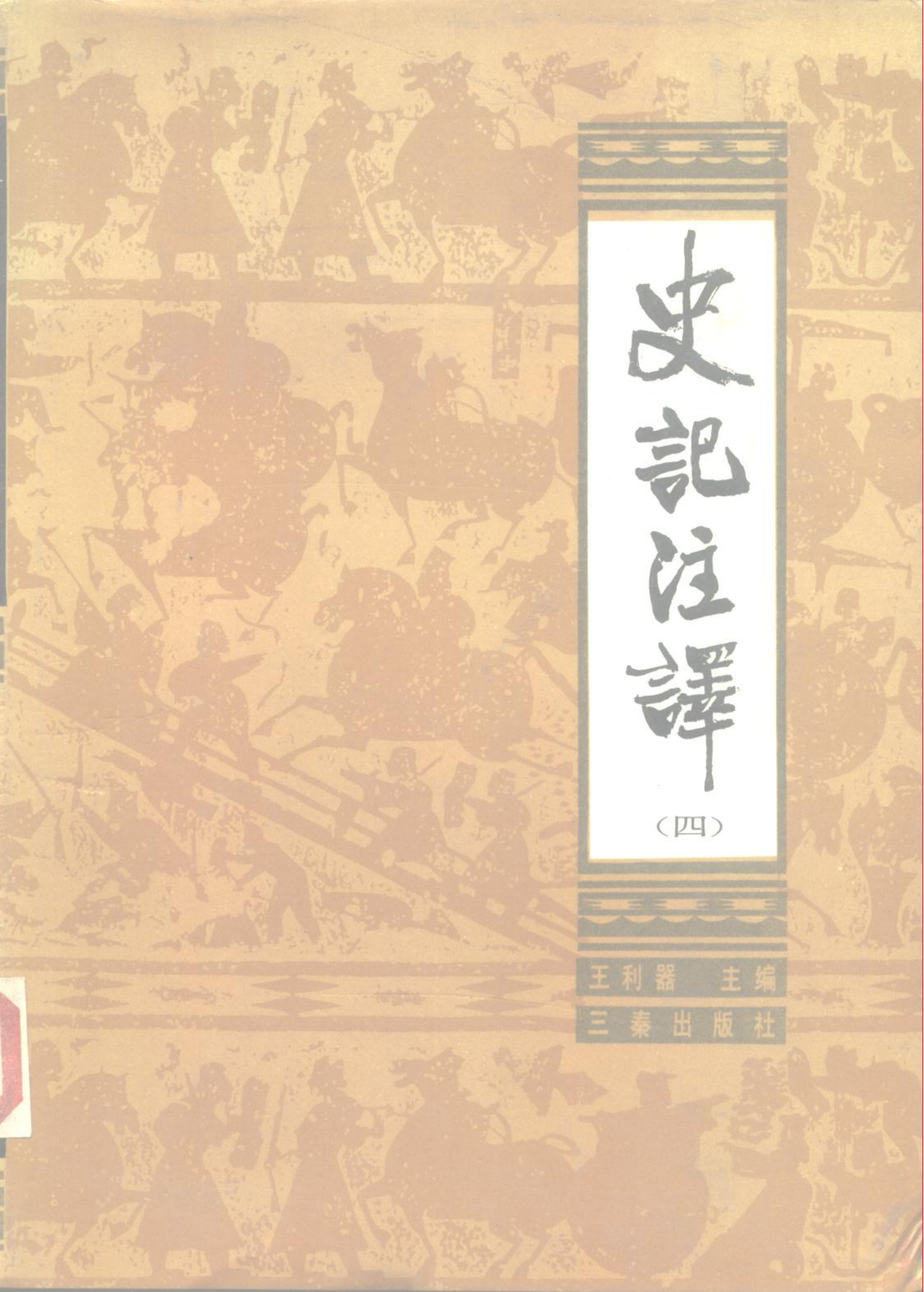


史記注譯

(三)

王利器 主編

三秦出版社



史記注譯

(四)

王利器 主編

三秦出版社

王利器 主编

一本纪表

史記注譯

三秦出版社

王利器

主編

二書世家

史記注譯

三秦出版社

王利器

主編

三
列
傳
(一)

史記注譯

三秦出版社

王利器

主編

四
列
傳
(二)

史記注譯

三秦出版社

封面题签：周谷城
责任编辑：周鹏飞
封面设计：解维国

顾问 张舜徽 刘乃和

主 编	王利器		
副 主 编	张 烈	陈秉才	曹相成
编 委	田久川	李庆善	祁念曾
(以姓氏笔划 为序)	陈蒲清	夏琼英	曹日升
	龚浩康	路志霄	
组织出版	欧阳俊	陈宽基	陈聪尔

DR42/H6B

史记注译（一）

（全四册）

王利器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

（西安大湘子庙街12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6开本 55.5印张 1,385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ISBN7-80546-033-7/K·16 定价：25.00元

封面题签：周谷城
责任编辑：周鹏飞
封面设计：解维国

顾问 张舜徽 刘乃和

主编 王利器
副主编 张烈 陈秉才 曹相成
编委 田久川 李庆善 祁念曾
(以姓氏笔划 陈蒲清 夏琼英 曹日升
为序) 龚浩康 路志霄

DQ42/4613

史记注译(二)

(全四册)

王利器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

(西安大柵子庙街12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6开本 47.5印张 1,180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ISBN7-80546-033-035-3/K·18 定价 23.00元

封面题签：周谷城
责任编辑：周鹏飞
封面设计：解维国

顾问 张舜徽 刘乃和

主编 王利器
副主编 张烈 陈秉才 曹相成
编委 田久川 李庆善 祁念曾
(以姓氏笔划 陈蒲清 夏琼英 曹日升
为序) 龚浩康 路志霄

组织出版 欧阳俊 陈宽基 陈聪尔

DQ42/H613

史记注译(三)

(全四册)

王利器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

(西安大雁塔南大街12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16开本 印张36.25 字数900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200

ISBN 7-80546-046-9/K·21

定价：21.00元

封面设计
责任编辑
封面题签

解维国
周鹏飞
周谷城

顾问

张舜徽 刘乃和

主 编

王利器

副 主 编

张 烈

陈秉才

曹相成

编 委

田久川

李庆善

祁念曾

(以姓氏笔划为序)

陈蒲清

夏琼英

曹日升

龚浩康

路志霄

组织出版

欧阳俊

陈宽基

陈聪尔

DR42 / 16 B

史记注译（四）

（全四册）

王利器 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

（西安大湘子庙街12号）

人民卫生出版社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 × 1092 毫米 16开本 印张 40 字数 1,000 千字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10,200

ISBN7-80546-056-6/K·24 定价：23.00 元

史记注译序

我们祖国的古代文化遗产，如果完全不能为今人所接触，那便等于没有。能发生接触的办法，只有两个：或则提高阅读古汉语的能力，或则把古汉语译成现代文。凡研究所或大学文科研究人员自以提高阅读能力为必要；对一般读者来说，只需把古汉语译成现代文就行了。由曹日升等同志编撰的这部《史记注译》，无异于用现代文著的《史记》，最便于读者；对一般读者阅读古籍有帮助，对发扬光大古代文化遗产更有功劳。是一部好书。祖国古代文化遗产丰富，大部分都要如此加工一番。从今以后，希望这个工作能逐步开展。余不多叙，即以此为序。

周行城

1985年2月17日于北京

前言

引子

华夏炎黄，本深木茂，源远流长。溯禅让雍容，唐尧虞舜；兵戎革命，周武商汤。五霸会盟，七雄征战，诸子百家各主张。迨秦汉，开九州一统，勋业辉煌。

龙门司马子长，创巨制鸿篇立史皇。盖记事记言，体兼《左》《国》；亦褒亦贬，功继素王。学究天人，道通今古，述往思来为激扬。齐击节，赞风骚韵味，经典文章！

——调寄《沁园春》

秦王朝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统一，建立起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接着又统一了文字，这本来使文化学术的进一步发展获得了有利的条件。可是秦始皇不顾客观形势变化，继续坚持专制暴政，采取“焚书坑儒”的极端措施，实行摧残文化、禁锢思想的错误政策，这就给文化学术的发展造成了厄运。事物向极端发展，总是走向它的反面的。由于秦始皇实行了这一类的错误政策，结果导致本来是强大的秦王朝却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归于灭亡。

西汉王朝是利用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来的，它从正反两方面吸取了秦王朝的经验教训。“汉承秦制”，它基本上继承了秦王朝的政治制度，但却采取了许多很不相同的政策和策略。从汉高帝到汉景帝的六十多年间，西汉统治集团的总的指导思想是“休养生息”。因此，到汉武帝于公元前140年登上帝位的时候，出现了“吏安其官，民乐其业；蓄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网疏阔”¹这种政治经济上的小康局面，这就是历史上史学家所称道的“文景之治”。这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文化学术方面也出现了繁荣兴盛的景象。

由于政治经济形势和文化学术事业的不断上升，时代向人们提出了整理古今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并用来说明当时社会生活实际的要求。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么回事²。

图书典籍是文化学术的结晶，在秦、汉之际，遭到了秦始皇和楚霸王两次大规模的焚毁，“竹帛烟销”，“关河空锁”，这在我国文化学术史上是一场空前的浩劫。到汉惠帝时，才正式宣布废除禁止私人收藏图书的法令。到汉武帝时，更进一步建立了国家图书馆——石室金匱，派遣专人广泛搜集和抄写书籍，国家保存的书籍便逐渐丰富起来。这

是当时文化学术繁荣昌盛的标志，也更是学者专家们进行研究和从事著述的有利条件。

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和他的不朽巨著——《史记》，就诞生在这样的时代。

二

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县龙门（在今陕西省韩城县南）人。大约出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汉景帝中元五年）^③，到公元前九〇年（汉武帝征和三年）以后去世^④。他出身于史官世家，远祖曾经在周代累世担任史官，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作过很长时间的太史公^⑤。他童年时期曾经在家乡参加过农牧劳动，十岁开始学习古代典籍，后来跟随著名的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研究过《春秋公羊传》和《古文尚书》，深刻了解先秦和汉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及其斗争的历史，还具有相当广博的天文历数知识。他在学术方面的渊博知识和文学方面的精湛修养，是他能够写作《史记》的重要主观条件。

他二十岁上开始到祖国各地作长途旅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⑥。他经过这次长途旅行，广泛地考察了社会生活，了解了民情风俗，探寻了许多历史传说的遗迹，搜集了许多历史人物的传闻逸事。后来，他开始了作官的生涯，担任了汉武帝的侍卫官——郎中。在三十五岁的时候，他曾经“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⑦，参加了平定和开发西南夷的斗争，又有机会得以了解了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山川形势和风俗习惯，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见闻。三十八岁的时候，他继承父亲的遗职，也作了太史公，就开始了写作《史记》的准备工作。四十二岁的时候，他在主持制定《太初历》的工作以后，就正式开始写作《史记》了。

司马迁四十八岁的时候，因为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宫刑。这个事件在司马迁的生命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既给他在精神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创伤，可是也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写作，出色地完成《史记》这部鸿篇巨著的决心和毅力。今天的《史记》，就是他生命升华的产物。对于这桩历史公案，如果让我们时隔两千年的《史记》读者来评判的话，那我们要说的是：李陵的投降是可耻的，是应当受到谴责的；而司马迁为他辩护的动机却是纯正的，理由也是值得同情的；可是处在那样的封建专制时代，汉武帝的严酷处置也是不足为怪的：这就是历史的悲剧。因此，今天我们读起司马迁那篇掷地有声的名作——《报任安（少卿）书》来，总是要受到深刻的感动，产生强烈的共鸣，不能不为他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五十岁的时候，他被赦出狱，担任了中书令。这是一个本来由宦官担任的职务，虽然“尊宠任职”，可是对司马迁来说，却无异于在精神上加判了无期徒刑。

经过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到五十五岁的时候，他的毕生心血的结晶——《史记》完成了，他的“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的伟大理想终于实现了^⑧。就在这一年的冬季，他写下了《报任安书》那篇名文。那是《史记》的千载不绝的余音，也是《史记》的祝捷凯歌。从这以后，史籍中就再没有关于他的活动的记载了。

三

“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名^⑨，司马迁称他自己的这部著作作为《太史公书》，这

就是《史记》的原名。大概东汉班彪、班固父子开始非正式地专称《太史公书》为《史记》^①，一直到唐代编写的《隋书·经籍志》才正式把《史记》作为《太史公书》的专名。

我国早在商代就设立了史官，虽然他主要是掌管天文历法，但是朝廷的记言记事也是他的职责。《尚书》就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料汇编。从春秋、战国到秦、汉时代，陆续出现了一些专门的历史著作，如《春秋》、《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可是到《史记》诞生以前，一直没有一部全面的通史。自从《史记》问世，才开始出现了内容全面、体制完备、规模巨大的历史著作。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仿照《春秋》的体例，按年月记载大事，作为全书的总纲。“表”仿照周代史官谱牒的体例，创立“世表”、“年表”、“月表”三种形式，记事最为简明扼要。“书”仿照《尚书·禹贡》和《礼记》的体例，概述古来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成就。其中的《天官书》、《历书》、《河渠书》、《平准书》，总结了天文学、历数学、地理学和经济学的知识，是科学体系的雏形，有着重大的意义。“世家”是纪传结合的国别史，其中包括有从西周战国时期许多重要的诸侯国的历史。“列传”主要有“专传”、“合传”、“类传”，记载重要人物的事迹，但其中也包括特殊事业传、少数民族传、藩属国传、外国传等，叙述的方面非常广泛。五个部分互相联系，互相补充，而以“本纪”和“列传”作为经纬线，构成了一个完备的整体，在我国古代的历史著作中是空前的伟大成就。

《史记》改变了以往分国割据的历史概念，建立起我国历史的统一观和正统观。它的十二“本纪”上起五帝，经历三代一直到秦、汉，一脉相传，这种历史体系表示着国家的统一和人心的统一。这是秦、汉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在史学观念上的反映，对于以后两千年间我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起了深刻的积极作用。

《史记》开创了纪传体史书，成为了封建时代修史的范式，一直被以后历代史学家所推崇，接踵而起的是《汉书》，一直到《明史》，合称“二十四史”^②。这些被公认为所谓“正史”，它们的体例虽然各代略有改变，但大体总是遵循《史记》的成规。《史记》在过去史学界所占有的崇高地位和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由此也就可以想见了。

《史记》是我国古代的第一部通史，整理和保存了自从传说的五帝时代直到西汉中叶三千年间大量的历史资料，给我们今天研究那一段历史提供了全面的、系统的资料，为我国的历史学奠定了最初的坚实基础。

《史记》不仅是历史巨著，而且也是古典文学的名著。司马迁运用他那敏锐深刻的观察力和匠心独创的艺术手法，塑造了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形式。如《项羽本纪》、《魏公子列传》、《廉颇蔺相如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李将军列传》等篇所描写的那些历史人物，形象丰满，个性鲜明，声音笑貌栩栩如生，让我们今天读来，还仿佛如临其境，如见其人。这些人物和事件，有的就成为了后代小说、戏曲的题材。以后汉、魏、六朝的《列仙传》、《高士传》，唐、宋的传奇，明、清的志怪小说等，在体裁形式上也都是从《史记》发源的。尤其是《史记》那种准确精练、鲜明生动的语言风格，是汉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更成为唐、宋以后散文家们所揣摩效法的典范。

四

正因为《史记》在史学和文学两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所以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评

价一直是很高的。比司马迁稍后的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刘向、扬雄就都对它评价很高。东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由于保守思想严重，对司马迁的比较自由的思想观点有很多不同意见，可是他也仍然首次给予了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肯定：“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¹⁴南宋史学家郑樵说它“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¹⁵清代文学家、史学家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¹⁶直到现代，鲁迅先生也认为《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¹⁷，充分肯定了它在史学上、文学上的伟大成就。

也正因为《史记》的内容很丰富，可以说得上是体大思精，所以自汉至今学习和研究《史记》的人很多，注解、疏证、评论《史记》的专著也不少。特别是在清代，研究《史记》蔚然成风，名家名著盛极一时。历代研究《史记》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南朝宋代裴骃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张守节的《史记正义》、明代凌稚隆的《史记评林》、清代王元启的《史记正讹》、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和崔适的《史记探源》等，还有近人张森楷的《史记新校注》、陈直的《史记新证》和日本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这些都是我们今天阅读《史记》的主要参考书籍，本书也正是根据这些资料注释的。

五

我们称道了《史记》的那么多优点，是不是意味着它就是尽善尽美了呢？当然不是。首先，司马迁写作《史记》的根本目的是为颂扬西汉王朝的明圣盛德，维护封建统治制度服务；其次，《史记》所表现的以帝王为中心的英雄史观，二元论的世界观，动摇不定的天命观，宿命论的迷信思想，这些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性都在它身上留下了程度不同的烙印。但是总的来看，司马迁生活在两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他的史学成就远远超过了他的前人，他的思想认识水平也超过了他的同时代人，这是他的主要的基本的方面。

还有一点就是《史记》某些文字的出入和部分篇章的真伪问题，我们也得有所了解。司马迁广泛地搜集了上下几千年的文献典籍，整理选择，融会贯通，编写《史记》这样的空前巨著。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单就资料的整理来说，工作就非常艰巨复杂，因而疏漏讹误甚或彼此牴牾、前后矛盾，这类毛病本来就是难免的。更何况《史记》先经过一千多年的传钞，再经过将近一千年的转刻¹⁸，不光是字句有了出入，而且是篇章有补缀，有删改，有窜乱。其间重要的蛛丝马迹有这样一些：第一是西汉元帝、成帝时期褚少孙的正式补作，大都是至今有据可查的。其次是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缺了十篇，有录无书，可是他并没有交代缺的是哪些篇，这就留下了疑案。再次是东汉章帝让杨终对它进行了一番讨伐性的删砍。然后到三国时张晏才说亡失的是《孝景本纪》、《孝武本纪》、《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礼书》、《乐书》、《律书》、《三王世家》、《傅靳蒯成列传》、《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并且说褚少孙补作了其中的《孝武本纪》、《三王世家》、《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他虽然能够指篇道目，可是后人对他的说法仍然有很多异议。直到清末，崔适在《史记探源》中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认为《孝景本